

60J15/3503

毛佩琦 张自成 著

中国明代政治史

人民出版社

本 卷 提 要

本卷所叙述的内容是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光元年(1645年)共278年的政治史。但是它上溯到元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下延到南明唐王、鲁王、桂王等政权的政治活动,迄止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

本卷叙述明朝的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并分别给予评论。

明朝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制度统治的社会,仍具有以前历朝典型的特点,皇权与相权、皇帝与藩王的协调与冲突等等莫不如此。但明朝也有自身的特点,如宦官干政、党派之争等等。

明朝又是一个出现诸多新因素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与之相适应的启蒙思想文化,在政治上也有所反映。同时,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殖民主义者已经叩响中国的大门。中国与世界有了更广泛的联系。中西文化已发生直接的冲突与交融。但是李自成起义和清人入主打断了明朝发展的线索。中国失掉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宝贵机会。

目 录

中国明代政治史

一、明代政治概述	1
二、开国奠基	11
(一)红巾军与朱元璋的崛起	11
(二)明朝的建立	14
(三)统一全国	18
(四)集权的君主制	21
(五)监察与司法	24
(六)胡蓝之狱	28
(七)空印案和郭桓案	31
(八)文字狱	33
三、永乐盛世	37
(一)靖难之役	37
(二)宦官与厂卫	42
(三)南征北讨	46
(四)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53
(五)对日与对朝关系	56
(六)郑和下西洋	61
(七)唐赛儿起义	65

四、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	67
(一)仁宣之治	67
(二)内阁与宦官	71
(三)土木之变	78
(四)于谦	83
(五)夺门与曹石之变	88
(六)汪直与西厂	94
(七)弘治中兴	98
五、武宗乱政与世宗议礼	104
(一)武宗乱政	104
(二)刘瑾擅权	109
(三)宸濠与宸濠之乱	114
(四)大礼议	118
(五)严嵩误国	123
(六)内忧外患	127
六、暂短的振作复兴	135
(一)清官海瑞	135
(二)徐阶与高拱的政绩	139
(三)俺答封贡	144
(四)张居正改革	147
七、祸乱亡国	153
(一)万历怠荒	153
(二)矿监税使	157
(三)民变与兵变	161
(四)万历三大征	164
(五)奢安之乱	170

(六)东林党	173
(七)魏忠贤与阉党	178
八、鹿失中原	184
(一)明思宗无力挽狂澜	184
(二)后金崛起	188
(三)李自成和张献忠	194
(四)清兵入关	199
(五)史可法抗清	202
(六)南京陷落	206
九、余波	212
十、结语	221

一、明代政治概述

元朝末年,政治败坏,政权解体,民不聊生。在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的势力脱颖而出,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了江南重镇集庆(今南京),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朱元璋采用了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进一步增强力量,等待时机夺取全国政权。朱元璋先后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把控制的地盘扩大到江浙、江西、河南各行省(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在鄱阳湖会战大败陈友谅后,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但直到此时,朱元璋仍然奉农民起义军大宋政权韩林儿为主,使用龙凤年号。接着,他铲平张士诚,迫使方国珍投降,南征陈友定,势力向福建、广西等地区扩展。朱元璋见时机成熟,改用吴元年年号并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北伐中原,并于同年攻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这年闰七月,元顺帝放弃大都(今北京)出奔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随后徐达带兵进入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府。从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国号明字,本意出于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说,红巾军领袖韩山童曾称“明王”,其子韩林儿又称“小明王”。“明”即表示对“小明王”的继承,又寓奉天承运之意。

明朝建立之初面临的两大问题是进一步扫清残元势力和割据势力,以及整顿残破的经济以安定民生。明军四出,先后略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统一了除北元所控制的漠北以外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明朝着手清除元朝统治在中原以南地区的影响,改变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

一开始,明朝大体上继承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沿用中书省制度,在地方上沿用行中书省制度。朱元璋本人就做过大宋政权的江南行中书省丞相。但他看到了这种制度不利于皇权的加强,于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派布政使到地方掌管一省之政,改变了地方权力过大的局面。布政使主管行政、财政,职在执行朝廷政令而已。与布政使并立的,是提刑按察使掌管法庭、监狱,都指挥使掌管一省之军政。其下是府和州、县。这样既大大缩小了地方的权力,又简化了机构层次。中书省位高权重,丞相成为与皇帝抗衡的职务。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朱元璋就此取消了中书省和丞相的设置,由皇帝直接统管六部,使中央权力大大集中于皇帝手中,与此同时,对飞扬跋扈的权臣将帅次第剪除,以避免他们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还直接统领锦衣卫等禁军武装,利用超越司法权力之上的诏狱,对臣民进行严厉控制,实行“重典”治国,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军事统帅机关则由原来的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以分大都督之权。但是各都督府只管军政、军籍,不直接统帅军队,每有战事则由皇帝任命将军总兵官,指挥作战,战事完毕,将军交还佩印。此外,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和下设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对各衙门大小官员进行监督。行政、军事、监察三系统互不统属,而分别对皇帝负责。皇权从而大大加强。

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皇权的同时，朱元璋还实行分封政策，将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亲王下天子一等，虽元勋宿将不得与之均礼。亲王享有优厚的经济待遇，并有三护卫军队 3000 人至 19000 人不等。亲王所在地是各地要害之处，朱元璋分封的目的是屏藩帝室，在从东北到北方、西北的防御蒙古的边塞上的各亲王被称为塞王。虽然明朝的分封政策是“列爵不临民，分封而不锡土”，但由于在有战争时，亲王得参与出征并节制诸军，因而一些塞王，特别是燕王、宁王等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早在洪武九年，府学训导叶伯巨就上书给朱元璋，指出：“分封太多”，担心未来亲王会给皇帝造成威胁。朱元璋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骨肉”，要将他亲手射杀。虽然叶伯巨侥幸没被射杀，但还是被关入监狱而死。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朱元璋辞世。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改元建文。朱元璋为朱允炆留下的是一个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已得到恢复的国家。但是在建国 30 年之后，在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重典治国之后，有必要对政策做出调整，从武装开辟时期转入文治守成时期，从重典治国转向宽仁之政，为此建文帝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我们称之为建文新政。

但是客观形势并不允许建文帝朱允炆放手去实现他的理想政治。诸王已经对皇帝构成威胁，他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其时秦王、晋王已死，被封在北平的燕王是诸王之长，而且势力最强。燕王心怀异志，图谋篡位。朱允炆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卿黄子澄之计，施行削藩。他们先废掉了周王、岷王、齐王、代王、湘王，接着向燕王下手。但却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燕王朱棣以“靖

难”为号召起兵，与中央政权展开角逐。燕王首先控制了北平城（今北京），接着兼并了宁王的军队，与宁王相约将来得手后中分天下，在经过三年多的战争后，燕王带兵直指南京，左督督徐增寿谋做内应被杀，而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建文新政并没有能够展开。永乐帝虽然抨击建文帝变乱成法，声称要恢复祖宗旧制，但形势迫使他不能不继续对洪武以来的政策进行调整。

永乐帝首先对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手段之野蛮残忍，令人发指。那些拥护建文新政，在洪武霜雪之后得到过暂短的阳春和煦的忠臣赤子，慷慨赴难，亘古罕见。永乐帝为了钳制人口，焚毁一切建文史籍，抹杀一切可能指斥自己篡逆的证据，并且利用宦官设立东厂，以监视臣民，恢复了被朱元璋撤消的锦衣卫刑狱，超越法律对臣民以约束。同时，永乐帝进一步扩大了宦官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从此宦官无所不在。接着，他便继续进行削藩。他在即位之初，曾声称笃亲亲之义，从而给亲王一些优厚的待遇。但不久他便开始用各种借口削除可能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的亲王。与宁王中分天下的话早已忘了，宁王被内徙至南昌，谷王被徙往长沙，辽王、代王的护卫被削去，不准齐王离开京师等等。自永乐之后，亲王再也不能威胁皇帝，虽然后来宣德、正德年间都发生亲王叛乱，但无不旋踵而败。对亲王的限制越来越严峻，比如亲王就藩后不准返京，出城省墓也需要批准，二王不可相见等等，亲王成为徒拥虚名坐糜厚禄的赘疣。

洪武时撤销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增设四辅官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后又罢四辅官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以备皇帝侍从、顾问，其位仅五品，无印信衙署，在翰林院履

任支俸。永乐帝即位后，特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始称内阁。但这时内阁专掌诏册诏敕，不置官属，诸司章奏也不经过内阁，一切批答皆出自皇帝。洪熙以后，阁权渐重，六部渐秉内阁之意行事。内阁逐渐成为执政的中枢。

永乐帝是一代雄主，他不甘于守成，而热衷于建功立业。他继承了洪武时期对蒙古的武力打击和羁縻并举的政策，封瓦剌、鞑靼首领为王，但对于不驯服的本雅失里、阿鲁台和马哈木等，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五次带兵出塞征讨。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明朝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派陈诚、李暹等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和它们与明政府的联系。永乐帝还把明朝的势力扩到域外，在安南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派郑和带领一支二万余人的庞大船队多次出使西洋，所到各国纷纷来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永乐帝为了实现自己做天下共主的理想，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为了加强国内南北的联系而开通了大运河。永乐帝标榜文治，在他的命令下编纂了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但是与这些号称盛世的种种业绩相反，永乐年间百姓负担过重，民生艰难，因此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爆发了震动一时的唐赛儿起义。

永乐帝的死，结束了明朝开创奠基的时代。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他一反永乐之政，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继之的宣宗因循稳定，继续对永乐政治进行调整，形成了“仁宣之治”的局面，从此进入了守成时期。但在表面的安定与繁荣之下，潜在的统治危机也在加剧。吏治败坏，土地日益集中，流民大量出现，从正统初年起，接连发生各种人民的反抗斗争，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

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获的土木堡之变。明朝以50万兵力被瓦剌骑兵2万人击溃。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但是明朝在景帝和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很快就组织起力量,不仅抵御了瓦剌军队,成功地保卫了北京,而且迫使也先送还了英宗。土木之变并未能改变明朝与蒙古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瓦剌很快就恢复了对明朝的通使、通贡。土木之变也未能造成对明朝统治的根本的破坏。但是土木之变留下了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于是有英宗复辟,有曹石之变。

正统以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正统年间出现了像王振这样可以左右朝政的宦官。他们可以干预官员的任免,提督京营,监军统兵或坐营镇守。到成化十三年正月,明宪宗下令设立西厂,其权力又超过了东厂。孝宗即位后,斥逐奸邪,任用贤能,广开言路,改良政治,使得明朝“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暂时避免了明朝统治的危机。

明武宗即位是明朝进入祸乱时期的标志,这一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和文化思想都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封建阶级更加腐败,世俗民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武宗带头冲破传统礼教,破坏祖宗制度,是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这期间出现了权倾一朝的宦官刘瑾。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引导武宗荒政逸乐,大肆地聚敛钱财,以致民不聊生,安化王朱寔鐭,以诛讨刘瑾为借口,起兵造反。刘瑾被除掉之后,武宗继续荒政,宠倖江彬,嬉戏无度。宁王朱宸濠再次乘机而起。虽然宁王叛乱很快就平定了,而武宗也在亲征回途中染病不起。

世宗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承帝位,拨乱反正,锐意求治,但是很快这开始的锐志便消失了。嘉靖帝一心一意见大礼,一要树

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是要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结果朝政都以此划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朝臣中出现了一批善于察颜观色，专以议礼为能事的人，他们动辄以议礼干预皇帝的决策，打击政敌。一批新贵迅速上升，直臣难于立朝，像善于逢迎的张璁等则大行其道。明世宗还热衷于方术神仙，信用道士，一心炼“先天丹铅”，求长生不老，迷信“祥瑞”，粉饰太平。以致邪术横行殿陛，严嵩等人竟以善写“青词”而受到重用。

嘉靖一朝，明朝统治的危机继续加深，武宗以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的反抗已经从边远地区深入腹里，从矿徒和瑶民发展为基本农民群众。正德年间四川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历时数年，波及贵州、陕西、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历时三年，转战京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了嘉靖年间，起义更为频繁，两广、山东、山西、四川、江西所在皆反，而且不断发生兵变，兵变首先发生在边防重地的大同和辽东。后来又发生于南京。因此史家称其时是“纷纭多故，将废于边，贼沆于内”，“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在国内动乱不已的情况下，“南倭”、“北虏”的问题，也以嘉靖时为最严重。蒙古鞑靼部日益强大，先有“小王子”，后有俺答汗，对明朝的威胁日益严重，至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日本海盗商人争相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抢掠，他们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在沿海地区造成巨大破坏。嘉靖三十四年右都御史张经带领军民取得王江泾大捷，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势力，但直到嘉靖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明朝军队在戚继光、俞大猷的带领下，才取得了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明朝的有识之士试图有所振作。在嘉靖晚年，改革已成为一股潮流，潘季训从改革赋役入手，在

广东整顿均平里甲法，庞尚鹏则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其时皆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此时已进入了明朝的改革中兴时期。

明穆宗是个不喜繁重政务而喜欢游玩挥霍的皇帝，因此他也放手让臣下处理政务，一些能臣反得以借此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徐阶、高拱、海瑞，相继脱颖而出。神宗以冲幼即位，阁臣张居正借助太监冯保和太后，打击政敌，夺取了首辅之位，更是雷厉风行地推行一系列改革。他清丈土地，整顿财政，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边防，整顿吏治，整顿学校，十年之内，政令统一，财政有余，边防宁谧，多年积弊重病为之一清，明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但是中兴局面并没能持久。张居正死后，神宗再不受任何人限制了。起初，他还能勤于政务，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便开始懒于过问政事了，甚至长期深居宫中，不与朝臣见而。这使得明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局面，一切正常的朝廷礼仪如祭祀、时享、经筵日讲都废止了，朝臣的奏疏也常被搁置，各衙缺官不补，十署九空，几至于瘫痪。而这时朝廷上官员党派林立，由于立太子问题、京察大计问题各持歧见，互相攻击，党同伐异，争斗不已。顾宪成等一批失意知识分子声气相投，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被称做东林党。与之相对立的，则有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主张澄清吏治，铲除弊政，反对过份地敲榨百姓，要求维护礼教，敢于对皇帝提出激烈的批评。

而这时明神宗则大肆挥霍，大兴土木，以至帑金不足，派矿监税使奔赴全国各地搜刮钱财，造成对工商业正常经营的沉重打击，各地市民纷纷起而反抗矿监税使，爆发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明朝的统治机器走向全面解体，吏治败坏，军队腐朽，而巨

大财政开支和明朝因平倭、援朝抗倭和平定播州的叛乱等“三大征”所加剧的财政困难，又促使明朝加重赋税，搜刮百姓，从而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人民的反抗。明朝从此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因而史家有“明亡于万历”的说法。

泰昌帝只在位二十九天便因服用红丸而一命呜呼，继之即位的明熹宗也只在位七年。明朝政治仍无起色。朝政因“红丸”、“移官”案被搅得一片混乱。东林党曾经得势一时，他们对腐朽和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他们终于敌不过皇帝支持的宦官集团阉党，魏忠贤权倾一朝，遍植党羽，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就在朝廷上下的你争我斗之中，民众反抗愈演愈烈，而远在关外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崛起，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摆出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态势。这样三方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明思宗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外藩入承皇统，他决心挽狂澜于既倒，铲除阉党，锐意求治。他力行节俭，不近女色，察纳下言，一时颇有清明之象。但是，明朝的统治已经病入膏肓，宦官干政、党争派斗、吏治败坏、财政危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而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刚愎自用，用人不专，果于杀戮，柔于决断，使形势更加恶化，而李自成起义军则凯歌前进，最后终于攻陷北京，崇祯朝的文武大臣如鸟兽散，从其死者只宦官王承恩而已。

此后，福王被拥立于南京，犹有半壁江山。但，弘光朝廷腐败如故，很快就被清军摧毁了，明朝至此大势已去，虽有鲁王立于浙东，唐王立于福建、桂王立于广西，都已无济于事了。

李自成的军队并未能在北京久留，他们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起义军在短时期内衰落下去，明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在即皇帝位后被迫退出北京，清朝成了中原的新的统治者。

明朝自正德之后,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得到较大发展,在万历年间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世俗民风有很大的变化,文化思想也出现新的因素,启蒙思想、功利观念、市民文化得到发展,起到对旧制度、旧文化的瓦解作用。与此同时,耶稣会士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中国,他们把自己掌握的新的文化知识当做传教手段,与中国士大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徐光启等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西方的新的学术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与明末传统制度、文化的解体相一致,当时是个很开放的时代,不仅在文化上,在经济上也是很开放的时代。当时在西方已经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这时中国有一个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有可能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但不幸的是内乱打断了明朝进步的步伐,而取而代之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因为其自身的弱点和迅速失败无法使中国继续向前迈进一步,八旗铁骑带来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他们用新兴民族的强悍之力加固了已经散架的旧制度的破车,使它又摇摇摆摆地走了下去。

二、开国奠基

(一)红巾军与朱元璋的崛起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遍及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为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

韩山童祖籍濠城,其祖父曾因传播白莲教义而被加以“烧香惑众”的罪名,流放到永年(河北今县)。元末,韩山童继承祖业,利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和熟悉的传说,倡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并以白莲教会作为联络工具,暗地组织农民,准备起义。河南和江淮地区的人民,“多信之”。纷纷加入秘密组织,并从中涌现出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杜遵道、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

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等3000人在颖州颖上县白鹿庄聚会,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以红巾为号密谋起义。因消息泄露,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走。刘福通、杜遵道当机立断,随即起兵,迅速攻占了颖州。在打败随后赶来镇压的元军后,又连续攻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九月克汝宁、光州、息州,众至十万。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他们都

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

颍州红巾军一举，南北各地白莲教徒纷纷响应，李二、彭大、赵均用于徐州，王权于郑州，孟海子于襄阳，郭子兴于濠州，徐寿辉、彭莹玉于蕲州先后起兵。

彭莹玉是袁州人，出身贫苦农家。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当地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淮西。至正十一年八月，他与蕲州罗田布贩徐寿辉、麻城铁匠邹普胜在蕲州起兵，九月，攻下蕲水和黄州。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

与红巾军起义先后，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方国珍，浙州台州黄岩人，出身佃农。至正八年因杀死仇人，而逃命海上。他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亦屡次降元，据有庆元、温台之地。因其活动地区，正当元漕粮北运通道，所以元政府“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①而方国珍也接受了元江浙行省左丞相之职，年年治船，为元运粮于京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今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欺侮，于至正十三年正月与其弟张士义、张士信等十八人愤而起兵，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二月，攻下泰州、兴化。五月攻占高邮。次年正月，张士诚以高邮为都，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至正十四年九月，大败元丞相脱脱百万大军，取得高邮之战大捷。至正十六年（1356年）南下攻占平江（苏州）、湖州、杭州，迁都平江。

^① 《明史·方国珍传》。